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丛书之七

北方地区出土夏商周 时期青铜器研究

李海荣 著



K459

文物出版社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丛书之七

北方地区出土夏商周 时期青铜器研究

李海荣 著



文物出版社

北京·2003

封面设计 张希广
责任印制 陆 联
责任校对 赵 宁
责任编辑 段书安
王 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方地区出土夏商周时期青铜器研究/李海荣著.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9

(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丛书)

ISBN 7-5010-1474-4

I. 北… II. 李… III. 青铜器(考古) — 研究 —
中国 — 三代时期 IV. K876.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1451 号

北方地区出土夏商周时期青铜器研究

李海荣 著

*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五四大街 29 号)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1/16 印张:22.25

2003 年 9 月第一版 2003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0-1474-4/K·714 定价:110.00 元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任：李伯谦

副主任：王天有 王邦维 程郁缀 郭之虞

徐天进 赵化成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世长 王天有 王邦维 李伯谦

严文明 宋豫秦 何芳川 赵化成

序

李伯谦

李海荣博士的毕业论文《北方地区出土夏商周时期青铜器研究》，经过补充修改，即将付梓，的确是一件值得祝贺的事情。

中国北方青铜器是一个复杂的、研究起来困难很多的课题。这不仅是因为北方地区地域辽阔，自然地理环境千差万别；古代族系众多，且迁徙无常；考古学文化面貌多样，又缺乏连续性。而且还因为北方青铜器是一个国际性的研究课题，由于历史的原因，最早收集、著录和研究的学者多是外国人，中国学者涉足这一领域则相对比较晚近。许多青铜器的造型、纹饰与现今域外周邻各国出土的青铜器相同或相似，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要对在这样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中产生的青铜器分出不同的系统和族属，揭示它们之间以及与域外周邻各国出土青铜器的关系，的确困难很大，如果没有广博的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的基础，不懂得研究史特别是外国学者的研究史是难以胜任的。

但是，中国北方青铜器研究在中国青铜时代考古中又是一个占有重要地位的不能回避的课题。中国北方青铜器所依托的北方青铜文化是中国青铜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了解北方青铜器，不了解北方青铜器所依托的北方青铜文化，就难以深刻理解以夏商周文化为核心的中国青铜文化的结构体系及其起源、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就难以理解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中华统一文化面貌形成的过程。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北方青铜器研究是打开中国青铜时代许多研究难题的钥匙，是中国青铜时代考古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素有重视北方青铜器研究的传统。1956年，裴文中教授、吕遵谔先生带领北大考古专门化的学生到内蒙古实习，调查和试掘了著名的赤峰红山后遗址，发现了青铜时代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迹和遗物。1961年，邹衡、俞伟超、高明等先生带领学生到北京昌平雪山遗址实习，发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墓葬和居址；同年，白滨基先生带领学生到东北，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观民、徐光冀先生带领学生到内蒙古实习，调查、整理过许多青铜时代遗址的材料。1977年，李仰松先生带领学生到青海实习，在贵南县发掘了齐家文化墓地。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观民、徐光冀先生指导学生整理了赤峰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墓葬。我1961年毕业留校工作，

即有幸参加了昌平雪山遗址的发掘。1975年带领学生到青海、甘肃实习，调查、发掘了许多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遗址。1978年也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的整理。这些相关的教学安排，对培养学生对北方青铜文化研究的兴趣、提高学生对北方青铜文化的认识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做出了贡献。进入20世纪80年代，这一传统得到了进一步发扬。我指导的研究生先后在河北、内蒙古、山西、辽宁等省、自治区调查、发掘过几十处北方系统青铜文化遗址。1987年，还在读本科的李海荣就随硕士研究生王连葵到山西河曲、偏关一带做过调查，开始接触北方青铜时代考古问题。追述这段历史是想说明，李海荣以《北方地区出土夏商周时期青铜器研究》作为攻读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是有渊源的，也是有基础的。

李海荣从1984年入北大考古学系，读本科，读硕士，读博士，我和他断断续续前后相处十多年，对他是很了解的。他不属于那种绝顶聪明的人，但事业心极强，有毅力，有韧性。他一旦定下目标，一定会千方百计竭力去完成。在撰写论文的日子里，为穷尽材料，琢磨问题，他有时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在即将与读者见面的这部书中，作为其立论基础的附录部分，有9个附表，99张附图。附表中不仅对收集到的青铜器一一做了统计，还从1110个地点或单位出土的铜器中选出近5000件分门别类进行了类型学研究，一一划分了型、式和期别。从这些基础性的工作便不难看出，他付出了多么巨大的劳动。

本书正文，除绪论之外共分五章。绪论基本上是对北方地区出土青铜器研究史的回顾，而一、二、三、四、五章则是在对以上所提到的材料进行分析研究基础上，分别围绕不同的问题作出的概括和论断。其中第一章关于北方地区出土夏商周青铜器11期的划分、各期年代范围的推断和7个发展阶段的归纳，第二章基于文化因素分析作出的北方地区出土的夏商周青铜器可分为9个大群以及对其中北方系青铜器发展轨迹和特点的概括，第三章关于对北方地区出土的夏商周青铜器依6个时段所作的分区，第四章关于对不同时期北方地区青铜文化对其他地区影响的分析，第五章关于北方地区夏商周时期北方系青铜器所属国族的推断等，都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充分吸收他人研究成果而独立作出的论断。

回顾中国北方地区青铜器研究史，这部书可说是迄今为止有关北方地区青铜器最全面、系统的研究论著，是北方地区出土夏商周青铜器研究的重要收获。这部书有几个明显的特点。

一个是资料的完备性。从本书的注释可以看出，作者阅读过的发表有北方地区青铜器的考古简报、报告等原始资料和相关研究论著各有300篇左右，不敢说对北方地区出土的夏商周青铜器及其研究成果都已收集无遗，但其数量远远超过同类著作则是事实。

一个是十分注意出土青铜器的背景关系。尽量将青铜器回归到它的出土单位和从与

其同出的其他器物包括陶器等其他质料的器物的关系角度来考虑问题，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就青铜器研究青铜器，孤立地看问题的片面性。

一个是没有将北方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当成铁板一块，而是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从不同来源的角度将北方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分成了不同的组群和谱系。既重点考察了北方地区“土生土长”的北方系青铜器的发展历程与特点，同时又通过比较研究，揭示了北方系青铜器在发展过程中对其他青铜文化的影响和所受的影响，构建起了全景式的北方地区青铜文化发展演变的时空框架。

一个是没有停止在单纯的考古学研究层面，而是以古代文献、甲骨文、金文的有关材料为线索，力图将考古学研究上升到历史学的研究，在对北方地区青铜文化划分出不同谱系与区域的基础上，探讨了其国族。使读者通过“物”看到了“人”的活动。

任何学术研究都不会停止在一个静止的水平上。在我们从发展的角度，肯定这部论著取得的重要收获的时候，我想要特别指出，有关北方青铜器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例如，作者把我国甘青地区齐家文化出土的铜镜等归入北方系青铜器，无疑是正确的。但同为甘肃东部马家窑文化出土的铜刀却又被排除在北方系青铜器之外，认为“早于夏时期的北方系青铜器还没有产生”，恐怕还需要斟酌。作者“以战国时期秦、赵长城及燕北长城西段为中心的地区”作为北方地区，西面将乌鞘岭和贺兰山以西，东面将医巫闾山以东，北面将阴山、西喇木伦河一线以北，南面将西汉水、北易水、海河以南的地区统统划为北方地区之外，是否应从时代变迁的角度，考虑“北方地区”的概念应有所变化，不宜以一时的地域概念来规范整个夏商周时期所指的“北方地区”。此外，在文章的结构上，第二章基于文化因素分析所作的分群和第三章的文化分区如何更紧密的照应起来，给读者以更为简明扼要的认识，似乎也可以进一步推敲，力争更加完善。

学无止境。在我以十分喜悦的心情祝贺这部大作问世的时候，我更希望海荣还像以前读研究生时那样勤奋、刻苦，充满追求，在新的学术领域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是为序。

2003年6月20日

目 录

序	李伯谦 (I)
绪 论	(1)
第一章 北方地区出土夏商周时期青铜器的分期、年代及发展阶段	(22)
第一节 分期及年代	(22)
第二节 发展阶段	(27)
第二章 文化因素分析及北方系青铜器的发展轨迹和特点	(34)
第一节 分群	(34)
第二节 北方系青铜器的发展轨迹和特点	(47)
第三章 北方地区出土夏商周时期青铜器的分区	(56)
第一节 第一时段	(56)
第二节 第二时段	(57)
第三节 第三时段	(59)
第四节 第四时段	(62)
第五节 第五时段	(64)
第六节 第六时段	(66)
第四章 从青铜器看北方地区青铜文化对其他地区青铜文化的影响	(74)
第一节 对北方地区以外的中国南部地区青铜文化的影响	(74)
第二节 对北方地区以外的中国东部及东北部地区青铜文化的影响	(80)
第三节 对北方地区以外的中国西部地区青铜文化的影响	(82)
第四节 对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文化的影响	(84)
第五节 对中国境外青铜文化的影响	(87)
第五章 相关问题探讨	(95)

第一节 北方地区出土的夏商周时期北方系青铜器所属的国族	(95)
第二节 关于北方农牧交错带文化区	(110)
附录：北方地区出土的夏商周时期青铜器的类型学分析	(121)
附表一：炊食器断代表	(173)
附表二：酒器断代表	(180)
附表三：水器断代表	(186)
附表四：兵器断代表	(188)
附表五：工具断代表	(204)
附表六：装饰品断代表	(214)
附表七：车马器断代表	(235)
附表八：生活用具断代表	(241)
附表九：其他器物断代表	(243)
附 图	(245)
后 记	(335)

附图目录

图一：北方地区范围示意图	(245)
图二：北方地区早于夏时期的铜器	(246)
图三：Aa1 群炊食器器物图	(247)
图四：Aa1 群酒器、水器器物图	(248)
图五：Aa1 群兵器器物图	(249)
图六：Aa1 群、Ab1 群、Ab2 群工具器物图	(250)
图七：Aa1 群、Ab1 群装饰品器物图	(251)
图八：Aa2 群器物图	(252)
图九：Ab1 群炊食器器物图	(253)
图十：Ab1 群酒器、水器器物图	(254)
图十一：Ab1 群兵器器物图	(255)
图十二：Ab1 群车马器器物图	(256)
图十三：Ab2 群炊食器器物图	(257)
图十四：Ab2 群酒器、水器器物图	(258)
图十五：Ab2 群兵器器物图	(259)
图十六：Ab2 群装饰品器物图	(260)
图十七：Ab2 群车马器器物图	(261)
图十八：Ab1 群、Ab2 群生活用具及其他器物图	(262)
图十九：Ab3 群器物图	(263)
图二十：Ab4 群器物图	(264)
图二十一：Ab5 群、Ab6 群、Ab7 群器物图	(265)
图二十二：Ba 群器物图	(266)
图二十三：Bb 群器物图（一）	(266)
图二十四：Bb 群器物图（二）	(267)
图二十五：Bb 群、Bc 群、Bd 群器物图	(268)
图二十六：Ca1 群器物图	(269)

图二十七: Ca2 群器物图	(269)
图二十八: Ca3 群器物图	(270)
图二十九: Ca4 群器物图	(271)
图三十: Cb 群器物图	(272)
图三十一: Cc 群器物图	(273)
图三十二: Cd1 群器物图	(274)
图三十三: Cd2 群器物图 (一)	(274)
图三十四: Cd2 群器物图 (二)	(275)
图三十五: Ce 群器物图 (一)	(276)
图三十六: Ce 群器物图 (二)	(277)
图三十七: Cf 群器物图	(277)
图三十八: Cg1 群器物图	(278)
图三十九: Cg2 群器物图	(279)
图四十: Ch 群、Ci 群器物图	(280)
图四十一: Ci 群器物图	(281)
图四十二: 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出土的八至九期部分青铜器	(281)
图四十三: Cj 群器物图 (一)	(282)
图四十四: Cj 群器物图 (二)	(283)
图四十五: Cj 群器物图 (三)	(284)
图四十六: G 群器物图	(285)
图四十七: H 群器物图	(285)
图四十八: Ck 群器物图	(286)
图四十九: Cl 群器物图 (一)	(287)
图五十: I 群器物图	(287)
图五十一: Cl 群器物图 (二)	(288)
图五十二: Cm 群器物图	(289)
图五十三: Cn 群器物图	(290)
图五十四: Co 群器物图	(290)
图五十五: Cp 群器物图	(291)
图五十六: Cq 群器物图	(292)
图五十七: Cr 群器物图	(293)
图五十八: Cs 群器物图 (一)	(294)
图五十九: Cs 群器物图 (二)	(295)

图六十：鄂尔多斯地区出土的十一期部分金器、银器、铅器和铁器	(296)
图六十一：Ct 群器物图	(297)
图六十二：Cu 群器物图	(298)
图六十三：Cv 群器物图	(299)
图六十四：Cw 群器物图（一）	(300)
图六十五：Cw 群器物图（二）	(301)
图六十六：Cx 群器物图	(302)
图六十七：D 群器物图	(303)
图六十八：E 群器物图	(304)
图六十九：Fa 群器物图	(304)
图七十：Fb 群器物图	(305)
图七十一：第一期分区示意图	(306)
图七十二：第二至三期分区示意图	(307)
图七十三：第四至五期分区示意图	(308)
图七十四：第六至八期分区示意图	(309)
图七十五：第九期分区示意图	(310)
图七十六：第十至十一期分区示意图	(311)
图七十七：与北方地区早于夏时期的铜器同出的部分陶器	(312)
图七十八：与 A、B、C、D 区铜器同出的部分陶器	(313)
图七十九：与 F、G 区铜器同出的部分陶器	(314)
图八十：与 Ha、I、J、K 区铜器同出的部分陶器	(315)
图八十一：与 La、M、N 区铜器同出的部分陶器	(316)
图八十二：与 O、P、Q、R、S 区铜器同出的部分陶器	(317)
图八十三：与 T、Ua、Ub、Uc、V 区铜器同出的部分陶器	(318)
图八十四：与 Wa、Wb、Wc、Xa、Xb、Xc 区铜器同出的部分陶器	(319)
图八十五：陕西省陕北以南地区出土的与北方地区青铜文化有联系的 部分器物	(320)
图八十六：山西省中南部地区出土的与北方地区青铜文化有联系的部分器物	(321)
图八十七：河南省出土的与北方地区青铜文化有联系的部分器物	(322)
图八十八：河北省北易水以南地区出土的与北方地区青铜文化有联系的 部分器物	(323)
图八十九：山东省出土的与北方地区青铜文化有联系的部分器物	(324)
图九十：辽宁省医巫闾山以东地区出土的与北方地区青铜文化有联系的	

部分青铜器	(325)
图九十一：吉林省出土的与北方地区青铜文化有联系的部分青铜器	(326)
图九十二：内蒙古东北部及黑龙江省出土的与北方地区青铜文化有联系的 部分青铜器	(327)
图九十三：甘肃省乌鞘岭以西地区出土的与北方地区青铜文化有联系的 部分青铜器	(328)
图九十四：青海省出土的与北方地区青铜文化有联系的部分青铜器	(329)
图九十五：新疆出土的与北方地区青铜文化有联系的部分青铜器	(330)
图九十六：四川省出土的与北方地区青铜文化有联系的部分器物	(331)
图九十七：云南省出土的与北方地区青铜文化有联系的部分器物	(332)
图九十八：朝鲜半岛和日本出土的与北方地区青铜文化有联系的部分青铜器	(333)
图九十九：俄罗斯和蒙古出土的与北方地区青铜文化有联系的部分青铜器	(334)

绪 论

本书所指北方地区是以战国时期秦、赵长城及燕北长城西段为中心的地区，其东部以医巫闾山西麓为界，西部以乌鞘岭东麓至贺兰山东麓一线为界，北部包括阴山至西拉木伦河流域一线以南的宁夏、内蒙古中南部至内蒙古东南部及辽宁西部，南部包括洮河上游和西汉水以北的甘肃东部、陕北、晋西、晋北及北易水和海河以北的京、津、冀北地区^①（图一）。多年来北方地区出土了大量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中不仅有源于北方地区以外的器物，而且还有大量的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器物（详见第二章第一节）。北方地区出土的具有地方特色的青铜器，学者或称为“绥远青铜器”^②，或称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③，或称为“北方式青铜器”^④，或称为“北方系青铜器”^⑤。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青铜器资料的丰富，以及比较精确的铜器年代学的建立，可以确定这类具有地方特色的青铜器最早出现于北方地区，并随后影响到了北方地区以外。但是这类青铜器在北方地区的分布并不仅仅局限于鄂尔多斯地区或过去的绥远地区，而且在广阔的北方地区之内还有一些区域性的差别，所以把这类青铜器统称为“北方系青铜器”或“北方式青铜器”比较合适。

北方地区地域辽阔，自然环境复杂^⑥，从地貌来看，以太行山北部至大兴安岭南端一线为界，大致可以把北方地区分为两个既相互联系又有差别的自然区域。太行山北部至大兴安岭南端一线以西以高原为主，包括陇西高原、陕北陇东高原、山西高原的西北部和北部、鄂尔多斯高原及位于内蒙古高原上的阴山山地和河套平原等。该区域大陆性季风气候显著，基本为温带大陆性半干旱、干旱气候，热量和水分自东南向西北逐渐减少。这个区域的南部经水流长期侵蚀，黄土地表切割破碎，沟谷纵横，北部除河套灌区外，多为干谷、沙地和沙漠。该区域内黄河主流贯穿而过，从而形成大的沟谷和台地，其他还有洮河、大夏河、葫芦河、清水河、大黑河、无定河、清涧河、延河、恢河、牧马河、淳沱河等分流于本区内，形成小的沟谷和台地。太行山北部至大兴安岭南端一线以东以平原和山地为主，包括海河平原、冀北山地、辽西低山丘陵和昭盟高原等。这个区域基本为中温带、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热量和水分从南向北、自东向西递减。该区域的河流，在燕山以北主要有大凌河、小凌河、锡伯河、老哈河、教来河、滦河、桑干河等，燕山以南主要有拒马河、白沟河、永定河、潮白河、蓟河等。北方地区总的现

代自然环境特征可以概括如下^⑦：处在东南季风与西南季风作用的边缘地带，降水分布呈现出自东北向西南延伸，东南向西北更替的规律，大部分地区的年平均降水量极不稳定且极不均匀，从而导致农牧业生产不稳定、农牧交错带的空间摆动；由于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所组成的 N 形山体的影响，山体西、北、西北侧为典型的牧区，山体的东、南、东南侧为典型的农区，其间形成了典型的农林牧交替地带；处在内、外流域的过度地带，河流、湖泊的水文特征变化多端，因而水蚀、风蚀、风水蚀交错，冻融侵蚀普遍发育，形成严重的以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为特色的土地退化过程；这一地区主要是以灌木和草本相交织的灌木草原地带，乔木林仅在局部水分条件较好的地段分布，构不成大面积的森林地带。

北方地区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做过研究。纵观北方地区夏商周时期青铜器的研究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初始阶段

初始阶段的时间跨度基本是在 20 世纪的民国时期。

这个时期国外学者所做的工作较多。一方面，他们在我国收集北方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并对这些青铜器加以著录，如萨里莫尼 (A. Salmony) 的《卢芹斋收藏的中国—西伯利亚艺术品》^⑧、安特生 (J. G. Andersson) 的《动物纹中狩猎巫术的含义》^⑨和《鄂尔多斯青铜器选集》^⑩，以及水野清一、江上波夫的《绥远青铜器》^⑪等著作和文章中都有不少北方系青铜器的著录。另一方面，他们对我国商周青铜文化、北方地区青铜文化和中国境外青铜文化的关系也进行了一些探讨。他们的意见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类。一类意见认为北方系青铜器在中国境外的青铜文化中产生，而影响到中国的北方地区青铜文化和商周青铜文化，如罗斯陀夫采夫 (M. Rostovtzeff) 最初认为中国西周时期铜器的某些兽形饰与斯基泰文化的兽形饰相合，它们同源于亚述巴比伦艺术^⑫，后来又认为中国早期的兽形饰与斯基泰早期的兽形饰没有关系，而可能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兽形饰为同一来源^⑬；萨里莫尼 (A. Salmony) 认为中国北方的透雕带饰是仿造了米奴辛斯克的标本^⑭；水野清一、江上波夫认为北方系青铜器的年代上限在公元前 500 年以后，北方系青铜器从黑海沿岸的斯基泰发源，由西向东顺次流传，而“绥远青铜器的主体，相当于卡拉苏克文化的后半期”^⑮；艾思克 (G. Ecke) 认为中国殷代的兽形饰当起源于北欧亚草原地带^⑯；罗越 (M. Loehr) 认为殷代的铜矛头等源于西北方的塞伊马文化，弓形器和兽形饰器源于卡拉苏克文化，甚至中国的冶铜术也是由西方经西伯利亚或新疆传入的^⑰。另一类意见认为北方系青铜器由商文化产生，逐渐传播至中国境外，如叶慈 (W. P. Yetts) 认为中国铜器的兽形饰当起源于中国^⑱；怀履光 (W. C. White) 认为殷代的兽形器是斯基泰、西伯利亚兽形饰的来源^⑲；高本汉 (B. Karlgren) 认为殷商文化影响了卡拉苏克文

化,并说兽首刀、兽首剑、环首刀、管釜斧、弓形器等产生于殷商文化,以后渐次传到鄂尔多斯、绥远、蒙古、叶尼塞河流域及南俄的斯基泰文化^①。此外,国外的学者对北方地区出土的青铜器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研究。江上波夫把北方地区的短剑推定为史书中的匈奴“径路刀”,并以“径路刀”名称本身和作为斯基泰短剑而知名的短剑进行了语言学的比较^②。30年代出版的梅原末治的《战国式铜器之研究》^③一书中的第一部分,对1923年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的青铜器进行了研究,通过分析这些器物的形制和纹饰而将其时代定为战国。

民国时期,中国学者也对北方地区出土的青铜器进行过著录,并对北方地区青铜文化、商文化和中国境外青铜文化的关系发表过一些意见。在著录方面,着重对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的一些青铜器进行著录,主要有1931年编印的《山西省各县名胜古迹古物调查表》、1935年麻国华编印的《浑源出土古物图说》、1936年商承祚编印的《浑源彝器图》等^④。此外,《商周彝器通考》中也对浑源李峪出土的青铜器有著录和论述^⑤。1929年,李济先生针对一些国外学者中国境外青铜文化影响殷商文化的观点,提出兽形饰在殷代当早已盛行,兽形饰与北方的关系如何还有待于中国方面更多资料的发现,对国外学者的观点持怀疑态度^⑥。1933年,李济先生提出殷墟出土的矢鏃、句兵、矛、刀与削、斧与铍,与西伯利亚所出的铜器的关系——尤其是叶尼塞河流域一带——可谓特别的密切,是殷墟影响到了西伯利亚^⑦。1949年,李济先生又提出了殷商文化兽形饰影响殷商以后盛行于北方民族的兽首刀的意见^⑧。在40年代,高去寻先生曾讨论过殷墟HPKM1005所出一面铜镜与卡拉苏克文化铜镜的关系。他认为虽然殷墟的一部分铜器,如矢鏃、矛头、斧头、刀子之类与米奴辛斯克出土的有共同性,“但亦须殷墟此种文化与叶尼塞河早期金属文化之关系阐明之后,则两地所出铜镜之关系始可得而言之”^⑨。

这个时期北方地区出土青铜器的著录,多是收集所得,除少部分青铜器知道明确的出土地外,大多数器物没有明确的出土地和可供断代的共存遗物。而且北方地区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基本是空白的,一些国外学者对北方地区所获青铜器资料的研究分析,多是参考中国境外考古工作建立的标准来进行年代、来源等方面的推断。这个时期由于受到当时所据有材料及其考古学研究水平的限制,对北方地区青铜器(特别是北方系青铜器)的各种推断,其结论一般都论据不足,多带有猜测的成分。但是这个时期所做的工作,对北方地区青铜器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二、发展阶段

发展阶段的时间跨度基本是在20世纪的50至70年代中期。

这个阶段的研究工作主要是接着上一阶段中国北方地区青铜文化与中国境外青铜文化的关系这个课题来做的,而且主要还是国外学者在做工作。杰特玛尔(K. Jettmar)认

为高本汉(B. Karlgren)所说的米奴辛斯克的兵器、工具是来自中国北疆迁移的人群的产品是对的,但他不认为兽形饰是中国起源的,猜测兽形饰先由贝加尔方面传入中国,然后又伴随中国优越的冶金术再传回北方^②。前苏联学者吉谢列夫在《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一书中^③,认为在米奴辛斯克随葬品的代表性器物中存在着来自东南方的中国北部居民带到叶尼塞河沿岸的器物,这一点对刀和戈来说是可以肯定的,对短剑和某些饰物来说也是可以推测的;中国北方动物纹饰中的野兽立像、山羊立像、卷身虎形像则是仿造了塔加尔文化的原作。吉谢列夫在四、五十年代认为卡拉苏克文化的某些青铜器源于中国北方(源头在商文化),而且认为中国北方非殷商族迁徙到米奴辛斯克盆地,同当地居民融合而创造了卡拉苏克文化,“独特的卡拉苏克文化铜器、陶器和装饰艺术,与长城以北那些地区(鄂尔多斯、绥远、热河)最为接近”^④。而50年代以后,他又认为是塞伊马文化影响了商文化,继而商文化向北传播影响到了卡拉苏克文化^⑤。1968年苏联出版的《西伯利亚史》(卷I)则说卡拉苏克文化传播到了遥远的东方——外贝加尔、蒙古、鄂尔多斯、安阳^⑥。前苏联学者奥克拉德尼科夫认为“野兽纹的真正创造者是欧亚大陆的草原部落,其中首先是黑海沿岸地区和亚洲中部草原的居民——斯基泰人”,然后从西伯利亚草原通路出发,通向中央亚细亚,直到鄂尔多斯^⑦。前苏联学者契列诺娃认为管釜斧源于近东,并经阿富汗、新疆传入中国北方;中国北方和卡拉苏克文化的管釜戈直接源于阿富汗和新疆,并同更早的伊朗戈有关^⑧。契列诺娃还认为鄂尔多斯、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的环首刀是卡拉苏克文化环首刀的先驱;卡拉苏克居民的祖先有一支渗入内蒙古、鄂尔多斯和东北南部,同当地居民融合而形成石棺墓文化、后夏家店文化及其他文化,卡拉苏克文化的个别器物也向南传入中国殷代(至迟在周代)^⑨。《匈奴世界》一书^⑩,推论匈奴式镞不是起源于斯基泰人或萨尔马提亚人,而是起源于中国北部和西北边境。《朝鲜青铜遗物研究》一文^⑪,认为朝鲜半岛的多钮镜的祖型为朝阳十二台营子的多钮镜,铜戈是以中国的铜戈为祖型的。

这个阶段中国学者所做的研究工作不是太多。高去寻先生的《殷代的一面铜镜及其相关问题》(1958年)一文^⑫,认为卡拉苏克文化中的兽首刀、弓形饰、长釜斧受殷商文化的影响,铜戈则完全是中国文化影响下的产品。唐兰先生的《“弓形器”(铜弓秘)用途考》(1972年)一文^⑬,认为弓形器是弓上的辅件——弓秘,是弛弓时缚在弓里以防弓体损害的。此外,中国学者还对这一阶段北方地区出土的一批先秦时期青铜器进行了一些年代判定、特征分析以及小区域内若干批材料的对比等方面的基础研究。

这个时期在北方地区相继发现了大批的青铜器,特别是不少遗址和墓葬的发现和发掘,出土了许多地点明确而且有共出物的青铜器,这为北方地区青铜器的研究提供了一批科学、准确的材料。随着北方地区考古工作的进展,这个阶段的研究工作较前一阶段更具有科学性,研究结论也开始逐渐摆脱过去比较随意推测的局面。但是,由于这个时